

#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湘鄂渝黔邻际村落为例

谭志刚<sup>1</sup>, 陈志远<sup>2</sup>

(1. 南华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2.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民俗体育治理是基层治理和体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为理论指导, 构建了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以5个湘鄂渝黔邻际地域的村落为案例地, 采用决策试验与评估试验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完善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事理因素是评价民俗体育治理最重要的方面, 其次是人理因素, 再次是物理因素;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总体评价为“一般”, 人理维度表现为“较好”, 物理维度和事理维度表现为“一般”, 各子维度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由此, 文章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维度, 提出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的建议, 为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民俗体育治理; 评价体系; WSR方法论; 模糊层次分析法;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4)01-0047-16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202.001

民俗体育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 由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使用, 并传承延续下来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习惯<sup>[1]</sup>。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村落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民俗体育面临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sup>[2]</sup>。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也指出要不断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民俗体育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已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sup>[3]</sup>。因此, 构建合理的民俗体育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有利于对民俗体育治理的实际状况进行审视和反思, 促进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长足有效开展。

“治理”源于古希腊语言中“引领与掌舵”, 原意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及框架下使用权威、引导控制相应的计划和策略<sup>[4]</sup>。与统治不同, 治理是由共同目标下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构成,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体育治理是将“治理”概念, 引入体育学领域, 提升

体育领域的公共利益<sup>[5]</sup>。围绕体育治理, 学界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关于如何开展体育治理工作, 任海<sup>[6]</sup>从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探讨了体育治理元素、治理结构等问题, 强调了推动体育治理逻辑转型与创新的重要性。邱海洪等<sup>[7]</sup>以湖南省“汝城香火龙”活动为田野个案, 分析了乡村精英在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重要角色。向军等<sup>[8]</sup>研究了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二重性特征, 提出了民俗体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调动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自我认识。为探讨民俗体育有效治理的实施路径, 廖上兰等<sup>[9]</sup>对民俗体育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开展实证研究, 发现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化传承的必由之路。马德浩等<sup>[10]</sup>分析了新时代下,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转变。李若洋等<sup>[11]</sup>总结了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内部逻辑, 建构了

收稿日期: 2023-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114)。

第一作者: 谭志刚(1964—), 男, 湖南祁阳人, 教授,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与治理。

通信作者: 陈志远(1996—), 男, 江苏宿迁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 环境与基层治理。

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民俗体育治理与乡村治理的交互关系,认为民俗体育是乡土文化的载体,对于乡村具有重要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sup>[12]</sup>。实现民俗体育的有效治理不仅有利于乡村振兴,还可助力乡土文化传播,提升基层管理效能<sup>[13]</sup>。为分析体育治理工作的状况,董红刚<sup>[14]</sup>提出了“两脉络三维度”的体育治理水平分析框架。黄红媛等<sup>[15]</sup>运用比较与类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研究方法,对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胡庆山<sup>[16]</sup>从治理“投入—过程—产出”三维视角构建了农村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农村体育治理水平的分布。

民俗体育治理不单单涉及由上至下的政府管理,还包含了“自治”和“德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sup>[17]</sup>。“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相互贯通、交叉、渗透的综合集成,融合了硬系统思想和软系统思想,有助于更为科学系统地剖析复杂系统问题。在体育学领域中,已有戚俊娣等<sup>[18]</sup>运用WSR系统方法论,对如何提升山东体育文化自信力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了发展群众体育文化时遇到的问题;李国等<sup>[19]</sup>借助WSR系统方法论分析了群众体育系统的影响因素,认为物理因素是群众体育工作开展的前提与基础,人理因素贯穿始终并起到合理配置体育资源的作用。

既有文献的体育治理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聚焦体育治理的物理和人理因素,忽视了治理工作本身的因素作用,没有把事理层面充分考虑在内。此外,民俗体育不同于一般体育项目,具有独特的民族气息和地方色彩,已有的体育治理评价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文化要素,不适用于评价民俗体育治理水平。因此,在对湘鄂渝黔邻际地域的5个村镇开展调研的基础上,本文结合WSR系统方法论,加入民俗体育治理的事理层即“怎么治理”的量化指标,并考虑民俗体育的文化属性,首次构建了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估了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的治理水平,并基于此建构了相应的民俗体育治理提升模式。相比已有研究,本文以WSR系统方法论为指引,可以充分剖析民俗体育治理工作,构建更全面的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

标体系,并增强评价工作的系统性。

##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介绍

参照评价理论、社会指标理论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本文以WSR系统方法论为思维指引,运用文献法和德尔菲法,遵循“原则指导→目标确定→WSR系统理论分析→评价指标遴选→指标体系确定”的基本思路,构建民俗体育治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并未考虑专家思维一致性的问题,可能得出具有偏差的评估结果,从而引发错误的认识。为避免以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决策试验与评估试验法(DEMATEL),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FAHP),构建了改进的评价模型。

### 1.1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

民俗体育治理涉及自然环境、组织管理、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管理系统<sup>[20]</sup>。评估民俗体育治理水平不仅要评价治理的模式本身,还需要考虑治理工作对民俗体育保护、传承、发展的实际影响,以及治理范式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情况<sup>[21]</sup>。运用单纯的文献资料法和德尔菲法,容易遗漏评价指标的维度,无法准确地认识民俗体育治理的现状。鉴于此,本文以WSR系统方法论为指引,先后聚焦民俗体育治理的物理、事理和人理,开展了3次专家讨论,构建了民俗体育治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更为全面、系统地考虑民俗体育治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领域专家团队共计10人,分别来自3所不同的普通高等学校,包括3位高校民俗体育教学的专家、4位从事民俗体育治理研究的专家、3位高校体育教育与管理学的专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课题组基于专家访谈结果,制定了评价指标提纲,并开展实地调研,和不同层级体育部门农村体育工作负责人、民俗体育传承人、普通村民,开展集体座谈和个人访谈,听取其意见和反馈,充实完善了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 1.1.1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挖掘

在民俗体育治理水平评价工作中,评价指标的选取非常重要,能否建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直接影响评价工作的有效性。民俗体育的文化属性、根植环境的物质属性、制度和组织结构保障以及公

众、村民的能动性等都是开展治理工作不可或缺的要害,而且要素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着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效果<sup>[22]</sup>。评价民俗体育的治理水平,需要兼顾要素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民俗体育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物、事、人的因素。以WSR系统方法论为指引,梳理评价、体育评价、民俗体育评价和民俗体育相关的政策文件,汇总能够反映民俗体育治理内涵的要素,并预选出符合指标构建要求的部分,组成预选指标集。将物理层、事理层和人理层分别对应民俗体育治理的物理影响子系统、制度设计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分析探讨和挖掘民俗体育治理的评价指标。

第一,物理维度。物理是指事物的客观存在,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反映治理体系对民俗体育客观本质的影响。王智慧<sup>[23]</sup>指出无论是哪个利益层级开展治理工作,都会对民俗体育客观状况造成影响。民俗体育是治理工作的客观受体,物理维度测度了治理工作下客观受体的变化。而民俗体育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主动性是维系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良好的环境是保障民俗体育妥善治理,促进民俗文化遗产的要素<sup>[24]</sup>。因此,本文围绕治理工作是否有利于民俗体育的保护传承以及可持续发展,分别从民俗文化属性、根植环境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衡量民俗体育治理工作在物理维度的影响。

民俗体育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民俗文化在民间长期积淀的成果,蕴含了大量珍贵的文明记忆。如何将这些民俗体育动作、文化、语言留存下来,传承下去,是当前治理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倪军等<sup>[24]</sup>认为视频、图像、音频等资料是研学民俗体育的重要参考;刘小明<sup>[25]</sup>提出需要对民俗体育进行改造,使它适应新的环境,为参与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吴燕等<sup>[26]</sup>从“以体促旅、以旅兴体”的视角,强调了搭建少数民族体育交流平台对延续民俗文化的支撑作用。因此,实施民俗体育治理不仅需要整理保存相关资料、推进其现代化改造,还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民俗文化保护。结合相关文献和专家建议,本文设置资料整理与保存情况、创新改良进展、交流平台建设情况和文化传统保护情况4个指标,来衡量治理工作对民俗体育文化属性的影响。由于民俗体育多广泛分布在农村地区,根植环境衡量的

便是治理工作对民俗体育所处地域的交通、人文和经济的影响。民俗体育治理中,完善的体育产业、充足的农村体育人才、设施齐全的体育场地以及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保障治理成效的外部因素。此外,方隅倪等<sup>[27]</sup>强调了民俗体育融合信息产业的重要性,认为要加强共同数据应用,开发共融产品,实现共同效益。因此,本文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产业融合开展情况和村民心理认同情况3个指标,来衡量治理工作对民俗体育根植环境的影响。为应对上级领导检查,地方的政府部门可能存在“运动式”治理的现象,可持续性则从治理作用的可延续性,衡量民俗体育的治理水平。从民俗体育管理到民俗体育治理的转变,是以多部门相互调和、不以支配为基础,依赖彼此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过程。连续的治理政策是保障工作接续开展的基础,也是保持治理成效,避免出现“倒车”现象的重要支撑。此外,在对民俗体育所处物理环境进行改造过程中,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sup>[28]</sup>。所以,如何妥善处理好民俗体育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也是衡量治理工作水平的要素。结合文献资料和专家意见,本文选取治理政策的可持续性、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3个指标,来评测治理工作的可持续性。

第二,事理维度。事理维度主要体现做事的道理,聚焦怎样做的逻辑分析,反映民俗体育治理开展的组织、制度和程序,涉及多主体间的结构形态、交互关系、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等<sup>[29]</sup>。结合对社会治理制度的评价,本文从治理框架、治理过程和治理要素3个角度,解析民俗体育治理的事理维度,构建民俗体育治理的事理维度评价指标,涉及民俗体育治理系统的结构体系、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动员体系和制度体系5个特征要素。

借鉴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本文对结构体系、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动员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评价指标进行梳理<sup>[30]</sup>。民俗体育治理结构体系是处理主体是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主要参与方包括政府、社会和村落,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平等、相互依赖又不完全对称,却相互制约的完整链条关系。治理措施由上至下,反馈意见由下至上,伴随底层村民的交互影响便构成了民俗体育的治理结构体系。考虑该体系中的主体

以及相应的交互关系,构建治理工作的结构体系衡量指标,包括多元主体的发育程度、主体间相互制约的能力和主体协同的难易程度3个指标。民俗体育的组织体系解决社会公众和各类群体何以平等参与的问题。民俗体育的组织体系涵盖了各层级治理组织,包括底层的村落社区组织、中层的社会活动组织、顶层的行政管理组织。因此,分别设置社区组织的发育程度、社会自组织程度和体育组织改革创新的发展3个指标,衡量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组织体系情况。民俗体育服务体系解决治理主体的基本需求问题。当治理体系无法保障和满足参与方的需求时,参与主体将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会变成搅局者。将社会治理的服务体系评价思想引入体育治理,本文从需求与供应的匹配情况、民俗体育治理的覆盖面和服务质量3个方面,来衡量民俗体育治理的服务体系。民俗体育治理的动员体系解决村民、公众和政府参与协商、决策、行动和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如果民俗体育治理的各个主体均能够平等参与相关社会资源分配、公共政策设计、政府公共开支的评价和监管,民俗体育治理的动员机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设置村民的参与意愿、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和政府响应社会诉求的效率4个指标,来衡量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动员体系情况。民俗体育治理的制度体系解决治理工作的正当性、法理性和规范性问题。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体制基础,是每个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由于民俗体育广泛分布于乡村地区,村民体育意识普遍比较薄弱,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至关重要<sup>[31]</sup>。因此,本文选取制度法规的针对性、民俗体育治理政策的完备性和治理政策的可操作性3个指标,来衡量民俗体育治理的制度体系。

第三,人理维度。人理维度主要思考做人的道理,回答最好怎么做的问题,反映治理系统对民俗体育参与人的影响。受现代文化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民俗体育文化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民俗体育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日常的操练,如何将民俗文化“讲下去,传出去”是民俗体育治理需要做好问题。由于民俗体育是治理的客体,治理工作的人理效果主要体现在村民和传承人的变化上,因此,本文将人理维度划分为活动开展、

经济与就业和民俗体育宣教3个方面,来衡量治理工作对民俗体育人理维度的影响。

民俗体育的主体是农民,开展民俗体育活动是传播民俗体育文化最直接的手段。民俗体育活动开展得越频繁,民俗文化传播得越顺畅,治理工作的效果越好。实际上,民俗体育表演带来的收益微薄,多数青壮年群体会选择进城务工,每年仅有春节的假期才返乡。时间的断层使得一些民俗活动无法开展,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也随之逐渐消亡。为逆转以上困境,最好的方式是给予民俗体育活动一定的资金支持,建立基础的“活动经费”供给体系。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民俗体育的特殊性,避免民俗活动流于表面,注重保护和传播其内部的文化核心。因此,本文使用民俗体育的活动次数、资金支持情况和文化内核传播情况3个指标,来规范良好的民俗体育活动开展。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农村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农村社会安定,农民才想留在农村,才会更加主动地参与民俗体育活动。民俗体育的治理工作唯有顺应我国社会当前发展的趋势,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才能更好地发展民俗体育事业<sup>[32]</sup>。因此,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民俗体育相关的就业人数和传承人的就业满意度3个指标,来衡量经济与就业要素。受西方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思想的影响,注重健身、强调教化的中华传统体育思想始终被压制着,民俗体育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民俗体育项目逐渐被边缘化,西方体育项目已成为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导致年轻一代逐渐遗忘了传统的民俗体育文化。加强民俗文化的宣扬传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拓展我国的民俗体育教育,已成为治理工作的当务之急。赵文力<sup>[33]</sup>认为搭建体育文化宣传平台,打造中华体育文化宣教基地,利用多样化的媒体手段,向群众普及、培训、习练传统民俗体育是打造地方民俗文化的最好手段。叶小瑜<sup>[34]</sup>强调了建立民俗文化教育基地,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是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实现民俗体育在各类人群中“复兴”,不仅需要加大日常宣教力度和媒体宣传,还需要在当地打造民俗体育教育平台。因此,本文设置民俗体育宣传教育使用媒体传播情况、民俗体育宣教情况和民俗体育教育基地数量3个指标,来衡量治理系统对

民俗体育宣教的影响。

物理维度、事理维度和人理维度的评价指标相互作用,耦合形成了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层次结构。民俗体育治理系统中的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的要素并不是独立的,他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并通过耦合作用决定着治理工作的效果。民俗体育治理的物理和事理的关系是本质与表象。本质揭示治理工作的客观影响与内部规律,表象是治理工作的外在表现。表象聚焦治理工作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的评价,本质则揭露了治理工作对客观存在的实践效果。物理和人理的关系是客观与能动。客观物质决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民俗体育根植的环境和自身的属性影响公众和村民的行为,同时,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物质,推动民俗体育向上发展。事理和人理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事理研究如何去做或者怎么实现民俗体育的善治目标,规划了整体路径,人理探讨怎么做最好,考虑了人的决策能用性,更加聚焦最优措施。总之,物理维度、事理维度和人理维度相互影响,互为补充。通过系统分析构建的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正确把握三者的矛盾统一关系,有利于系统评价治理工作的效果。

#### 1.1.1.2 开展田野调查完善指标体系

以WSR系统方法论为指引,运用德尔菲法和文献法,研究对民俗体育治理的指标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初步构建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物理影响子系统、制度设计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后,课题组第一次走访了湘鄂渝黔邻际地域民俗体育富集且具有代表性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花垣县茶峒镇、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重庆市秀山县洪安镇、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百福司镇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和完善。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是散落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和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黔江区和贵州铜仁市等地州市中的农村地区,是我国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民俗体育文化的富集区。以浦市龙舟赛为例,其面临的“集体活动合法性”问题,是很多地区民俗体育活动开展同样需要处理的问题<sup>[35]</sup>。因而,本文的实证研究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湘西矮寨镇民俗体育文化

底蕴深厚,被誉为“苗鼓之乡”,拥有跳鼓舞、竹竿舞等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该镇民俗体育发展相对较好,民俗体育治理工作具有一定代表性。矮寨镇文化站负责村落民俗体育活动的组织者S先生认为:“我们这里很多人从小就跟随、观看父辈表演,大家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学好并继承这些本村落的‘传统习俗’;老祖宗留下来代表我们根脉的东西如果在我们手里失去了,我们就是罪人。”他非常认可将民俗体育文化认同放到评价体系中,也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凝聚保护民俗文化的社会共识。但他还提出教育基地是地方政府为保留宣传民俗体育文化而兴建的设施,体现了政府积极治理民俗体育的态度。教育基地更多是改善了他们开展民俗文化的教育的环境,建议把教育基地建设情况修改为根植环境要素的指标。

边城龙舟活动召集人T先生说:“我们的活动很少依赖政府或赞助商的支持,很少有物质回报,仅为了丰富空余生活,锻炼身体,传承自身血脉。”但他也表示:“我们这种情怀在年轻一代中很难传播,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出去闯荡,挣大钱。”T先生认为把政府资金支持、村民收入情况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是合理的,“能留住年轻人,我们这些民俗文化才有未来”。此外,在T先生看来,提升村民对民俗文化的认同是治理对人思想的影响,建议把村民心理认同情况调整为入理维度中宣传教育要素的指标。

在整理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完善,并添加了对应指标的解释。最终,完善后的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层次如表1所示,评价体系共分为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维度,维度之下设置了11特征要素,并借助35个具体指标来衡量这些要素。

#### 1.2 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FAHP是一种经典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能够对非定量事件进行量化研究,并很好地解决专家思维不一致的问题<sup>[36]</sup>。FAHP在体育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如刘涛<sup>[37]</sup>运用FAHP,建立了体育设施项目的融资模式选择的评价模型,并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是最佳方案。叶楠等<sup>[38]</sup>构建了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FAHP评价模型,发现山东体育市场的发展模式为“一般”。然而,在实际的评价工作

表1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Tab.1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维度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B <sub>1</sub> 物理	C <sub>11</sub> 文化属性	D <sub>111</sub> 资料整理与保存情况	政府对民俗体育有关资料收集整理保存的情况
		D <sub>112</sub> 创新改良进展	为适应发展需要,民俗体育进行改良创新的进展
		D <sub>113</sub> 交流平台建设情况	国家及省市政府组织开展民俗体育交流的情况
		D <sub>114</sub> 文化传统保护情况	民俗体育传承发展过程中,文化保护的落实情况
	C <sub>12</sub> 根植环境	D <sub>121</sub>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乡村中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D <sub>122</sub> 产业融合开展情况	民俗体育文化旅游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开展情况
		D <sub>123</sub> 教育基地建设情况	政府建设民俗体育教育基地规模和数量的情况
	C <sub>13</sub> 可持续性	D <sub>131</sub> 治理政策的可持续性	政府实施的民俗体育治理政策的可持续性
		D <sub>132</sub> 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	民俗体育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
		D <sub>133</sub>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当前治理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C <sub>21</sub> 结构体系	D <sub>211</sub> 多元主体发育程度	社会团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发展情况
		D <sub>212</sub> 主体间相互制约能力	民俗体育治理工作中各利益方彼此制约的能力
		D <sub>213</sub> 主体协同难易程度	工作中各主体进行协调合作的难易程度
		D <sub>221</sub> 社区组织发育程度	民俗体育相关的社区组织的发展情况
C <sub>22</sub> 组织体系	D <sub>222</sub> 社会自组织程度	社会默契自主地形成有序组织结构的能力	
	D <sub>223</sub> 体育组织改革创新进展	为提升民俗体育治理能力,体育组织改革的情况	
	D <sub>231</sub> 需求与供应的匹配情况	政府的治理与民俗体育匹配吻合的情况	
B <sub>2</sub> 事理	C <sub>23</sub> 服务体系	D <sub>232</sub> 民俗体育治理的覆盖面	治理对各类民俗体育的覆盖情况
		D <sub>233</sub> 服务质量	治理对民俗体育传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D <sub>241</sub> 村民参与意愿	村民参与民俗体育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的意愿
	C <sub>24</sub> 动员体系	D <sub>242</sub> 社会组织参与意愿	社会组织和团体加入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意愿
		D <sub>243</sub> 市场主体参与意愿	市场主体参与民俗体育开发的意愿
		D <sub>244</sub> 政府响应诉求的效率	政府响应其他群体诉求的效率
	C <sub>25</sub> 制度体系	D <sub>251</sub> 制度法规针对性	民俗体育保护、传承和发展相关法规制度的针对性
D <sub>252</sub> 治理政策的完备性		民俗体育治理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备程度	
D <sub>253</sub> 治理政策的可操作性		政府制定的民俗体育治理政策贯彻实施的难易程度	
B <sub>3</sub> 人理	C <sub>31</sub> 活动开展	D <sub>311</sub> 民俗体育活动情况	民间开展民俗体育活动的人数、频次和规模的情况
		D <sub>312</sub> 资金支持情况	各级政府为补助民俗体育活动提供的财政拨款情况
		D <sub>313</sub> 文化内核传播情况	民俗体育活动文化培养,精神内核的传播情况
	C <sub>32</sub> 经济与就业	D <sub>321</sub> 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民俗体育活动每年给农村居民带来的收入情况
		D <sub>322</sub> 民俗体育相关就业情况	当地从事民俗体育相关产业工作的
		D <sub>323</sub> 传承人就业满意度	民俗体育传承人留乡工作的满意程度
C <sub>33</sub> 宣传教育	D <sub>331</sub> 村民心理认同情况	村民对当前民俗体育开发发展状况的认同情况	
	D <sub>332</sub> 民俗体育宣教情况	每年地方开展民俗体育宣传教育活动的频率	
	D <sub>333</sub> 媒体传播情况	通过电视、网络和宣传条幅等方式的传播情况	

中,评价指标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关联关系,影响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的准确性。DEMATEL通过计算出每个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可以充分反映元素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能够消除评价指标间的关联影响关系。考虑到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复杂性,以及评价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影响关系,遵循局部精准与整体模糊、独立分析和关联集成相结合的评价机制,运用DEMATEL对FAHP评价模型进行改进,改进的评价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表2 重要程度评价标度  
Tab.2 Evaluation scale of importance degree

$x_i$ 与 $x_j$ 的重要度比较	同等重要	稍微重要	明显重要	强烈重要	极端重要	介于其间
标度 $x_{ij}$	1	3	5	7	9	2,4,6,8

注:根据标度的互反性,  $x_j$  与  $x_i$  重要度比较的标度  $a_{ji} = a_{ij}^{-1}$

然后,根据式(1),计算层次单排序的一致性指数  $CR_s$ ,以衡量不同专家评分间的偏离程度。当  $CR_s < 0.1$  时,认为基础判断矩阵的偏离程度在允许范围内,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通过。

$$CR_s = \frac{\lambda_{\max} - n}{RI(n-1)} \quad (1)$$

式(1)中:  $\lambda_{\max}$  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n$  为层次内的指标数,  $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具体取值如表3。

表3 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参照系数  
Tab.3 Reference coefficient of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n$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层次总排序是某一层中所有元素相对最高层指标的重要性权重,可根据式(2),计算其一致性比率  $CR_t$ 。当  $CR_t < 0.1$  时,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通过。

$$CR_t = \frac{CI}{RI} = \frac{a_1 CI_1 + a_2 CI_2 + \dots + a_m CI_m}{a_1 RI_1 + a_2 RI_2 + \dots + a_m RI_m} \quad (2)$$

在此基础上,引入模糊数学的理论,消除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模糊性等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在基础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通过后,计算基础判断矩阵的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确定FAHP指标的初始权重。运用式(3),对基础判断矩阵进行简单加

权处理,计算评价指标的集结结果。然后,利用式(4),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所有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初始重要度权重为  $\tilde{s}_i$ 。

$$\tilde{a}_i = \tilde{a}_{i1} + \tilde{a}_{i2} + \dots + \tilde{a}_{ij} + \dots + \tilde{a}_{im} = \left( \sum_{j=1}^n a_{ij}^s, \sum_{j=1}^n a_{ij}^m, \sum_{j=1}^n a_{ij}^b \right) \quad (3)$$

式(3)中:  $\tilde{a}_i$  表示评价指标  $i$  的集结结果,  $a_{ij}^s$  和  $a_{ij}^b$  分别为三角模糊数  $\tilde{a}_{ij}$  的下界和上界,  $a_{ij}^m$  是  $\tilde{a}_{ij}$  的中值。

$$\tilde{s}_i = \tilde{a}_i (\tilde{a}_1 + \tilde{a}_2 + \dots + \tilde{a}_n)^{-1} = \left( \frac{\sum_{j=1}^n a_{ij}^s}{\sum_{i=1}^n \sum_{j=1}^n a_{ij}^s}, \frac{\sum_{j=1}^n a_{ij}^m}{\sum_{i=1}^n \sum_{j=1}^n a_{ij}^m}, \frac{\sum_{j=1}^n a_{ij}^b}{\sum_{i=1}^n \sum_{j=1}^n a_{ij}^b} \right) \quad (4)$$

然后根据式(5),计算  $\tilde{s}_i \geq \tilde{s}_j$  的可能性  $v(\tilde{s}_i \geq \tilde{s}_j)$ 。

$$v(\tilde{s}_i \geq \tilde{s}_j) = \begin{cases} 1 & s_i^m \geq s_j^m \\ \frac{s_i^b - s_j^s}{(s_i^b - s_i^m) + (s_j^m - s_j^s)} & s_i^m < s_j^m, s_i^b > s_j^s \\ 0 & s_i^b \leq s_j^s \end{cases} \quad (5)$$

式(5)中: $s^b$ 和 $s^a$ 分别为 $s$ 的上界和下界, $s^m$ 为 $s$ 的中值。

再根据式(6),计算评价指标 $\tilde{s}_i$ 相比 $\tilde{s}_j$ 重要程度的优势度,记 $P(\tilde{s}_i \geq \tilde{s}_j)$ 。

$$P(\tilde{s}_i \geq \tilde{s}_j) = \frac{v(\tilde{s}_i \geq \tilde{s}_j) + 1 - v(\tilde{s}_j \geq \tilde{s}_i)}{2} \quad (6)$$

在确定所有评价指标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模糊互补矩阵,并利用式(7),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初始权重 $w_i$ 。

$$w_i = \frac{1}{n(n-1)} \left( \sum_{j=1}^n P(\tilde{s}_i \geq \tilde{s}_j) + \frac{n}{2} - 1 \right) \quad (7)$$

### 1.2.2 DEMATEL法修正指标权重

为消除思维混乱对专家实际打分结果的影响,采取专家打分的方式,对评价指标间的相对关系进行量化(0为无影响、1为弱影响、2为较弱影响、3为较强影响、4为强影响),建立直接影响矩阵 $B$ ,经规范化处理为矩阵 $G$ ,如式(8)。

$$G = B / \max_{1 < i < n} \sum_{j=1}^n b_{ij} \quad (8)$$

然后根据式(9),构造综合影响矩阵 $T$ 。

$$T = G(I - G)^{-1} \quad (9)$$

再计算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的乘积,如式(10)。

$$d_i = \sum_{j=1}^n t_{ij} \sum_{j=1}^n t_{ji} \quad (10)$$

并对计算结果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评价指标 $i$

的影响权重 $w_i^2$ ,如式(11)。

$$w_i^2 = d_i / \sum_{i=1}^n d_i \quad (11)$$

最后,根据上述的初始权重和影响权重,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综合修正权重 $w_i^{fix}$ ,如式(12)。

$$w_i^{fix} = w_i^2 w_i / \sum_{j=1}^n w_j^2 w_j \quad (12)$$

### 1.2.3 模糊综合评价

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后,为每个评价指标建立五个等级的评语集( $X = X_1, X_2, X_3, X_4, X_5$ ),依次表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整理汇总并制作成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开展田野调查,对湘鄂渝黔邻际的5个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同时,邀请民俗体育领域专家、民俗体育的传承人、村落居民,填写调查问卷,对当地民俗体育治理水平进行评价。最后,计算模糊评价矩阵,并按照隶属度最大的原则,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 $X_k$ 。

## 2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

### 2.1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本文按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原则,组织指标制定期间的10位领域专家,围绕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开展问卷调查,评价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从统计结果看,所有指标的“重要性”均值均在3.5分以上,表明专家对指标的认可度较高。指标的变异系数均低于0.25,说明专家意见协调度较高,证明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较好。

表4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重要性统计

Tab.4 Importance statistic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B_1$	3.7	0.678	0.183	$D_{114}$	3.7	0.678	0.183	$D_{241}$	4.1	0.544	0.133
$B_2$	3.9	0.544	0.140	$D_{121}$	3.8	0.622	0.164	$D_{242}$	3.8	0.622	0.164
$B_3$	4.0	0.667	0.167	$D_{122}$	3.7	0.678	0.183	$D_{243}$	3.9	0.767	0.197
$C_{11}$	3.7	0.678	0.183	$D_{123}$	4.1	0.544	0.134	$D_{244}$	4.1	0.544	0.133
$C_{12}$	4.0	0.667	0.167	$D_{131}$	3.8	0.622	0.164	$D_{251}$	3.9	0.767	0.196
$C_{13}$	3.9	0.767	0.197	$D_{132}$	3.9	0.544	0.139	$D_{252}$	4.1	0.544	0.133
$C_{21}$	3.8	0.622	0.164	$D_{133}$	4.2	0.622	0.148	$D_{253}$	3.8	0.622	0.164
$C_{22}$	3.9	0.544	0.140	$D_{211}$	3.9	0.544	0.139	$D_{311}$	4.3	0.456	0.106
$C_{23}$	4.0	0.667	0.167	$D_{212}$	3.7	0.678	0.183	$D_{312}$	4.0	0.667	0.167

续表 4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指标	$\bar{X}$	SD	变异系数
$C_{24}$	4.1	0.544	0.133	$D_{213}$	4.0	0.667	0.167	$D_{313}$	4.1	0.544	0.133
$C_{25}$	4.0	0.667	0.167	$D_{221}$	3.6	0.489	0.136	$D_{321}$	3.8	0.622	0.164
$C_{31}$	4.1	0.544	0.133	$D_{222}$	3.9	0.544	0.139	$D_{322}$	3.7	0.678	0.183
$C_{32}$	3.9	0.544	0.140	$D_{223}$	3.8	0.622	0.164	$D_{323}$	3.6	0.489	0.136
$C_{33}$	4.0	0.667	0.167	$D_{231}$	3.8	0.622	0.164	$D_{331}$	3.7	0.678	0.183
$D_{111}$	4.0	0.667	0.167	$D_{232}$	4.1	0.544	0.133	$D_{332}$	3.8	0.622	0.164
$D_{112}$	3.7	0.456	0.123	$D_{233}$	4.0	0.667	0.167	$D_{333}$	3.7	0.456	0.123
$D_{113}$	3.9	0.544	0.139								

2.1.1 评价指标一致性检验

按照式(1), 首先, 对指标体系的维度层进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5。由于  $CR_s = 0.0237 < 0.1$ , 所以评价体系维度层的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5 维度层的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5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ingle ordering at the dimension layer

维度层	$B_1$	$B_2$	$B_3$	结果
$B_1$	1	0.2	0.142 9	$\lambda_{\max} = 3.024 6$
$B_2$	5	1	0.333 3	$CR_s = 0.023 7$
$B_3$	7	3	1	通过

其次, 对要素层进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结果如表6。其中  $CR_s < 0.1$  均成立, 表明要素层也通过了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表6 要素层的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6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ingle ordering of the element layer

要素层	$C_{11}$	$C_{12}$	$C_{13}$	$C_{21}$	$C_{22}$	$C_{23}$	$C_{24}$	$C_{25}$	$C_{31}$	$C_{32}$	$C_{33}$
$C_{11}$	1	5	3								
$C_{12}$	0.2	1	0.5								
$C_{13}$	0.333 3	2	1								
$C_{21}$				1	3	7	5	9			
$C_{22}$				0.333 3	1	5	3	7			
$C_{23}$				0.142 9	0.2	1	0.5	3			
$C_{24}$				0.2	0.333 3	2	1	5			
$C_{25}$				0.111 1	0.142 9	0.333 3	0.2	1			
$C_{31}$									1	0.166 7	0.25
$C_{32}$									6	1	3
$C_{33}$									4	0.333 3	1
结果		$\lambda_{\max} = 3.003 7$ $CR_s = 0.002 6$ 通过			$\lambda_{\max} = 5.194 1$ $CR_s = 0.043 3$ 通过					$\lambda_{\max} = 3.053 6$ $CR_s = 0.051 5$ 通过	

第三, 对指标层进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考虑篇幅的因素, 仅展示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的结果(表7)。从检验结果可知  $CR_s < 0.1$  恒成立, 即评价体系的所有指标均符合一致性的要求。

最后, 对评价体系进行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结果如表8。结果显示,  $CR_t < 0.1$  恒成立, 即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明专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较好, 能够用于计算各指标权重。

2.1.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致性检验通过后, 借助MATLAB软件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计算结果如表9。维度层指标权重的排序为  $B_2 > B_3 > B_1$ , 表明事理因素( $B_2$ )是评价民俗体育治

表7 指标层的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7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ingle ordering at the indicator layer

指标层	$\lambda_{\max}$	$CR_s$	结果	指标层	$\lambda_{\max}$	$CR_s$	结果
$C_{11}-D$	4.133 4	0.050 0	通过	$C_{24}-D$	3.032 4	0.031 2	通过
$C_{12}-D$	3.002 6	0.002 5	通过	$C_{25}-D$	3.038 5	0.037 0	通过
$C_{13}-D$	3.044 1	0.042 4	通过	$C_{31}-D$	3.024 6	0.023 7	通过
$C_{21}-D$	3.002 0	0.001 9	通过	$C_{32}-D$	4.110 5	0.041 4	通过
$C_{22}-D$	3.053 6	0.051 5	通过	$C_{33}-D$	3.064 9	0.062 4	通过
$C_{23}-D$	3.024 0	0.023 1	通过				

表8 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8 Consistency test of hierarchical total ordering

层次	$CI$	$RI$	$CR_t$	结果
维度层	0.030 5	0.777 2	0.039 3	通过
要素层	0.020 7	0.587 3	0.035 3	通过

表9 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权重  
Tab.9 Indicator weights for folk sports governance evaluation

维度层	维度权重	要素层	要素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综合权重	权重排序
$B_1$	0.223 6	$C_{11}$	0.442 9	$D_{111}$	0.368 3	0.036 4	10
				$D_{112}$	0.132 3	0.013 1	30
				$D_{113}$	0.135 7	0.013 4	29
				$D_{114}$	0.363 7	0.036 0	11
		$C_{12}$	0.183 1	$D_{121}$	0.475 9	0.019 5	23
				$D_{122}$	0.241 2	0.009 9	33
				$D_{123}$	0.282 9	0.011 6	32
				$D_{131}$	0.145 3	0.012 2	31
				$D_{132}$	0.418 6	0.035 0	13
		$C_{13}$	0.374 1	$D_{133}$	0.436 0	0.036 6	9
				$D_{211}$	0.518 4	0.067 8	1
				$D_{212}$	0.207 4	0.027 1	15
				$D_{213}$	0.274 2	0.035 9	12
$B_2$	0.428 6	$C_{21}$	0.305 3	$D_{221}$	0.356 9	0.047 4	8
				$D_{222}$	0.173 6	0.023 1	17
				$D_{223}$	0.469 5	0.062 4	2
		$C_{22}$	0.310 1	$D_{231}$	0.395 2	0.019 7	22
				$D_{232}$	0.143 2	0.007 1	34
				$D_{233}$	0.461 7	0.023 0	18

续表 9

维度层	维度权重	要素层	要素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综合权重	权重排序		
$B_2$	0.428 6	$C_{24}$	0.193 1	$D_{241}$	0.394 6	0.032 7	14		
				$D_{242}$	0.195 5	0.016 2	24		
				$D_{243}$	0.242 9	0.020 1	20		
				$D_{244}$	0.167 0	0.013 8	27		
				$D_{251}$	0.145 2	0.004 7	35		
		$C_{25}$	0.075 4	$D_{252}$	0.420 9	0.013 6	28		
				$D_{253}$	0.433 9	0.014 0	26		
				$C_{31}$	0.248 7	$D_{311}$	0.590 2	0.051 0	6
						$D_{312}$	0.242 6	0.021 0	19
						$D_{313}$	0.167 2	0.014 5	25
$B_3$	0.347 8	$C_{32}$	0.355 8	$D_{321}$	0.193 7	0.024 0	16		
				$D_{322}$	0.417 2	0.051 6	5		
				$D_{323}$	0.389 1	0.048 2	7		
		$C_{333}$	0.395 5	$D_{331}$	0.145 3	0.020 0	21		
				$D_{332}$	0.418 6	0.057 6	4		
				$D_{333}$	0.436 0	0.060 0	3		

理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如何治理是开展民俗体育治理工作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白晋湘等<sup>[39]</sup>的研究结论一致,民俗体育治理常常存在治理主体缺位、越位和错位,以及过度商业化和功利化等问题,如何创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民俗体育实现善治的关键。人理因素( $B_3$ )的权重相对较大,体现了各主体的积极参与和直观感受在民俗体育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政府、社会和市场构成了民俗体育治理的多元体系,各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各不相同,各方积极参与民俗体育治理工作并获得合理收益,有利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运作系统,更有利于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系统有序地开展。

要素层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民俗体育宣教( $C_{33}$ ),表明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对民俗体育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村落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峻,应用网络化宣传手段,提升社会大众对民俗体育的认知水平,对引导社会力量加入民俗体育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组织体系( $C_{22}$ )的排序相对靠前,说明组织运行机制的优劣对科学有效地开展民俗体育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市场主体组织协调能力

的强弱,决定了民俗体育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是否能够有序开展,也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治理效果。

## 2.2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数据收集与处理

课题组根据研究需要,对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指标进行了归类,并将所涉及的指标转述为相应题项,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设计了《民俗体育治理状况调查问卷(干部问卷)》和《民俗体育治理状况调查问卷(村民问卷)》(以下简称“干部问卷”和“村民问卷”)。利用德尔菲法,向10位领域专家咨询了问卷内容、表述、结构上的问题,并开展了信效度检验。课题组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为目标区域,开展小样本问卷调查,采用克朗巴哈系数( $\alpha$ )对问卷进行检验,发现2份问卷均满足 $\alpha > 0.7$ ,表明拟定的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能够反映出被调查人的实际情况。然后,在第二次实地调研中,同时发放指标体系权重确定问卷与民俗体育治理状况调查问卷。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课题组累计发放了20份“干部问卷”和20份“村民问卷”,其中,“干部问卷”回收了19份,有效问卷为17份;“村民问卷”回收了18份,有效问卷为15份。在整合10位领域专家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总

结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结果,问卷调查结果的指标权重分布情况如表9。

表10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调查结果

Tab.10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in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D_{111}$	18	17	3	1	3	$D_{133}$	4	8	14	13	3	$D_{233}$	4	7	16	14	6	$D_{312}$	5	8	15	9	5
$D_{112}$	6	14	10	8	4	$D_{211}$	3	3	14	18	9	$D_{241}$	7	14	15	9	2	$D_{313}$	3	16	14	8	1
$D_{113}$	3	9	14	14	2	$D_{212}$	3	6	14	15	9	$D_{242}$	5	17	16	8	1	$D_{321}$	11	12	16	2	1
$D_{114}$	2	15	14	10	1	$D_{213}$	7	8	11	18	3	$D_{243}$	4	20	8	9	6	$D_{322}$	2	12	17	10	1
$D_{121}$	1	9	8	18	6	$D_{221}$	5	12	15	11	4	$D_{244}$	11	7	16	10	3	$D_{323}$	9	18	8	4	3
$D_{122}$	4	4	18	9	7	$D_{222}$	6	8	16	13	4	$D_{251}$	7	11	22	5	2	$D_{331}$	5	12	11	8	6
$D_{123}$	5	8	14	13	2	$D_{223}$	2	9	18	16	2	$D_{252}$	5	10	13	16	3	$D_{332}$	4	18	8	6	6
$D_{131}$	2	8	16	12	4	$D_{231}$	1	5	19	13	9	$D_{253}$	5	7	16	15	4	$D_{333}$	2	3	14	19	4
$D_{132}$	3	13	14	5	7	$D_{232}$	4	9	15	16	3	$D_{311}$	6	17	10	5	4						

### 2.3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结果分析

综合对地方农村体育工作负责人、普通村民和领域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利用调整后的指标权重,运用改进过后的FAHP方法,测算要素层和维度层的评价分布;根据隶属度最大的原则,确定各评价指标的等级,具体评价结果如表11。

可以看到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状况(A)综合评价为“一般”。尽管人理维度( $B_3$ )被判断为“较好”,但物理维度( $B_1$ )和事理维度( $B_2$ )的表现被判断为“一般”,说明湘鄂渝黔邻际村落依托行政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主体参与民俗体育的治理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在民俗体育发展、管理体系构建和资源利用等方面表现一般,未能充分发挥民俗体育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交

互作用。出现该现象的根源可能是地方政府“说多做少”,在上级政府的要求下,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民俗体育保护的宣教活动,提升了其在村民和公众中的曝光量。但偶尔的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民俗体育的客观本质,对治理制度、结构体系的影响也有限。民俗体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管理过程,地方政府需要统筹物理、事理和人理,查漏补缺,补齐和强化“短板”,保持和发展“长板”。因此,建议在保持政策引导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民俗体育的发展和根植环境的演变,及时改进治理措施,同时也要充分发展民俗体育文旅经济,调动社会组织和资本市场的积极性。

在物理维度的要素层中,民俗体育文化属性( $C_{11}$ )评价为“较好”,可持续发展性( $C_{13}$ )评价为“一般”,民俗体育根植环境( $C_{12}$ )评价为“较差”。这表

表11 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评价的结果

Tab.11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folk sports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等级	指标	$x_1$	$x_2$	$x_3$	$x_4$	$x_5$	等级
A	0.1103	0.2504	0.2988	0.2471	0.0934	一般	$C_{21}$	0.0872	0.1062	0.2804	0.3697	0.1565	较差
$B_1$	0.1320	0.2786	0.2794	0.2209	0.0891	一般	$C_{22}$	0.0801	0.2106	0.3528	0.2914	0.0651	一般
$B_2$	0.0938	0.1891	0.3183	0.2968	0.1020	一般	$C_{23}$	0.0599	0.1382	0.3626	0.2956	0.1437	一般
$B_3$	0.1167	0.3079	0.2871	0.2028	0.0855	较好	$C_{24}$	0.1393	0.3165	0.2907	0.1909	0.0626	较好
$C_{11}$	0.2038	0.3521	0.2243	0.1658	0.0540	较好	$C_{25}$	0.1126	0.1882	0.3321	0.2972	0.0700	一般
$C_{12}$	0.0680	0.1788	0.2883	0.3432	0.1217	较差	$C_{31}$	0.1251	0.3488	0.2829	0.1541	0.0891	较好
$C_{13}$	0.0783	0.2403	0.3403	0.2263	0.1148	一般	$C_{32}$	0.1540	0.3413	0.3168	0.1456	0.0423	较好
							$C_{33}$	0.0779	0.2521	0.2632	0.2847	0.1221	较差

明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较好的进展,民俗体育交流文化平台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民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自身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差,需要通过加大民俗体育文化宣传,推进体育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来引导村民参与民俗体育,并加深他们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此外,还要加强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杜绝“运动式”治理的问题,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保证民俗体育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在事理维度的要素层中,动员体系( $C_{24}$ )表现为“较好”,组织体系( $C_{22}$ )服务体系( $C_{23}$ )和制度体系( $C_{25}$ )表现为“一般”,而结构体系( $C_{21}$ )表现为“较差”,这说明各相关主体有意愿参与湘鄂渝黔邻际村落的民俗体育活动及其治理,民俗体育治理是广大村民和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响应的一项工作。但是,民俗体育治理未形成系统化的体系,各方的协同配合程度较差,各利益方未能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市场发育程度较差,现实中反映在结构体系较差,需要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并加以规范和引导。此外,在村民和社会团体具有强烈意愿的基础上,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做好对民俗体育开展和民俗体育治理的动员、服务和组织工作,加速形成规范化的民俗体育治理制度体系,以激发他们在民俗体育治理工作中的潜力。

在人理维度的要素层中,活动开展( $C_{31}$ )和经济与就业( $C_{32}$ )评价为“较好”,民俗体育宣教( $C_{33}$ )为“较差”。这表明湘鄂渝黔邻际村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的物质基础需求,而且民俗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较好,民俗体育运动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对民俗体育的宣传程度仍较差,未能充分把村民的参与意愿,化为参与民俗体育的具体行动,加强民俗体育宣教不仅是未来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全国其他拥有民俗体育文化地区需要实施的工作<sup>[40]</sup>。

总之,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的根植环境还有待改善,治理的结构体系以及宣传教育的工作依然存在不足。由于物理和事理维度存在不足,治理体系耦合影响民俗体育的能力较弱,所以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的效果一般。尽管人理维度的评价结果为较好,但是在该地区民俗体育的客

观存在和治理制度体系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很难维持。因而地方政府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重点提升治理体系在物理和事理维度的表现。根据各个维度评价指标的测算结果,本文发现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增强村民对民俗体育开发的认同感、提升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利益主体间相互制约、协调合作的民俗体育治理结构体系,以及推进民俗体育教育基地建设是改善物理和事理维度表现的具体方向。

### 3 结论及建议

民俗体育治理作为基础治理和体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考虑到民俗体育治理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本文首次将WSR系统方法论引入民俗体育治理评估领域,结合文献法和德尔菲法,分析构建了民俗体育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课题组相继前往湘鄂渝黔邻际的5个村落,开展实地调研,验证并完善了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本文还改进了传统的评估模型,运用DEMATEL改进FAHP,避免了评价主体思维混乱对结果的影响。以湘鄂渝黔邻际村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课题组第二次前往5个村落,并开展问卷调查。综合领域专家、地方农村体育工作负责人和普通村民的评价,本文得出了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的治理水平。田野调查发现,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振兴与治理表面上是由旅游开发所诱导,实质上却与深层次的多种因素密切关联。基于不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传统形成的民俗体育的社会形态各异,其治理的基础与条件也不尽相同。因此,探索新时代村落民俗体育的治理路径,必须首先弄清我国农村社会的“基底”或“底色”,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地探寻有效的治理道路。正如徐勇<sup>[41]</sup>所言:“农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地’和‘类’的属性和特质,政策制定者才可能‘因地’和‘分类’做出决策”。实证结果表明,事理因素是评价民俗体育治理最重要的方面,其次是人理因素,再次是物理因素。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总体评价为“一般”,人理维度表现为“较好”,物理维度和事理维度表现为“一般”,子维度要素层的指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结合所得结论,文章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维度,提出湘鄂渝黔邻

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的建议,为民俗体育治理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从对物理层要素的分析来看,改善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的根植环境是开展治理工作的首要任务。相关政府部门应解决乡村体育场地缺失的问题,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存在的短板。其治理工作并非简单地修建体育设施,还要围绕民俗体育活动的需求,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湘鄂渝黔邻际村落的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民俗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激励社会组织和资本市场参与民俗体育的治理工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帮助村落民众建设农家乐、民宿等旅游配套设施,解决村落群众在民俗体育开发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政府在整理和记录民俗体育使用的体育用具、乡土文化时,应积极引导民俗体育进行现代化改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做到求真务实,以实现民俗体育的长足有效治理。

从对事理层要素的分析来看,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的结构体系表现较差。相关部门应着重支持社会团体和当地百姓参与民俗体育的治理工作,提升相关主体自组织、自建构的体育治理意识和能力,转换政府在民俗体育治理中的地位。科学的民俗体育治理体系需要每个主体的积极参与,政府在其中主要承担“掌舵人”的角色,其他各主体应依据政策方向结合自身特点确定自己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充当“划桨人”的角色。政府相关部门在安排民俗体育治理工作前,应充分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地方民俗体育的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推进治理工作。并针对以往治理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价,反思和改进民俗体育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断推动民俗体育治理实现善治。

从对人理层要素的分析来看,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的宣传教育工作表现较差。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大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同时,推进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教育基地的建设。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精准推送信息已成为现实,借鉴应用相关技术开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工作,完善地方教育基地建设,打造“线上感受”加“线下体验”的民俗体育宣教模式。在建立民俗体育管理组织时,地方政府应主动吸纳当地传承

人的参与或接受传承人的监督,以提高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度。此外,应加强湘鄂渝黔邻际村落民俗体育治理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并给予民俗体育活动适当的资金支持,让群众切身地感受到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提升社会大众和民间群众参与治理工作的能力和意愿。

#### 参考文献:

- [1] 吴艳红,贺鑫森.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构建[J].体育学研究,2020,34(5):67-75.
- [2] 李文鸿,吕思泓,王天翔,等.民俗体育文化生成及社会功能阐释——以梅州客家“五鬼弄金狮”和“席狮舞”为中心[J].体育学研究,2021,35(1):87-94.
- [3] 李萍,汤立许.乡土危机与行动逻辑:民间体育与魅力乡村的融合治理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8):56-61.
- [4] ROSENAU J N. Governing the ungovernable: The challenge of a global disaggregation of authority[J]. Regulation & Governance,2007,1(1):88-97.
- [5] 郑志强,刘兵,任慧涛.全球体育治理变革的具体表现、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J].体育学研究,2023,37(2):63-73.
- [6] 任海.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J].体育科学,2020,40(7):3-13.
- [7] 邱海洪,江亮,郭振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乡村精英的话语权生成——基于湖南“汝城香火龙”的田野考察[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4):28-34.
- [8] 向军,张智.“礼物”与“商品”兼容: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二重性特征——基于湖南麻阳民间龙舟赛的田野考察[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4):121-133.
- [9] 廖上兰,吴玉华,肖锋,等.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及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20,40(11):31-41.
- [10] 马德浩.从管理到治理:新时代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主要转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7):5-11,55.
- [11] 李若洋,钟亚平.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J].体育科学,2022,42(5):18-28.
- [12] 王长龙,刘强,杨海晨.代际传承与冲突:新时代我国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3,39(3):71-80,107.
- [13] 郭子瑜,陈刚.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前提、价值意蕴与推进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2(11):1-7,21.
- [14] 董红刚.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9):18-24.
- [15] 黄红媛,李荣日.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理论要素研究:呈现与构建[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34(6):71-75,86.
- [16] 胡庆山,曹际玮.农村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5):26-38.
- [17] 倪军,杨淑梅,涂传飞,等.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研究——基于Y村龙舟的个案考察[J].体育学研究,2023,37(4):79-86,98.

- [18] 戚俊娣,贾连堃.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文化认知研究——基于WSR原理对群众体育文化的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21(11):138-142.
- [19] 李国.基于WSR方法论的群众体育系统影响因素与评价模型研究[J].体育科学,2012,32(4):29-34.
- [20] 王长龙,刘强,杨海晨.代际传承与冲突:新时代我国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3,39(3):71-80,107.
- [21] 谭青山,熊禄全,孔庆波,等.新时代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规划:逻辑、问题及方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3(8):37-43,65.
- [22] 孟林盛,乔恩东,李慧贤,等.村落民俗体育的文化生态适应与当代发展——基于下董寨村“跑马排”春节习俗的田野调查[J].体育与科学,2021,42(3):26-34.
- [23] 王智慧.乡土精英与族群边界的文化秩序——基于藏族三项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的质性考察[J].体育与科学,2022,43(2):63-75.
- [24] 倪军,杨淑梅,涂传飞,等.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研究——基于Y村龙舟的个案考察[J].体育学研究,2023,37(4):79-86,98.
- [25] 刘小明.民俗体育哲学论[J].体育文化导刊,2016(12):39-43.
- [26] 吴燕,冯胜刚,张元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23(11):88-94,109.
- [27] 倪方隅,尹翠玉,杨明.体育信息化助力乡村体育发展机制与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11):34-40.
- [28] 白晋湘,郑健.民族传统体育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阐释及实现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6):638-643.
- [29] 董红刚,易剑东.体育治理评价:英美比较与中国关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2):25-31.
- [30] 左晓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评价研究[J].社会科学,2016(4):55-63.
- [31] 吴湘军,白晋湘.湘鄂渝黔边区农村体育调查与分析[J].体育学刊,2008(2):41-44.
- [32] 王驰,何元春.地方性知识视阈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理念的反思及重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7):9-16.
- [33] 赵文力.中华体育文化特征与传承推广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3(9):29-34.
- [34] 叶小瑜,陈锡尧.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3(5):78-85.
- [35] 谭志刚,彭春兰.在绩效追求与信俗力量之间:湘西浦市龙舟活动复兴的集体行动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2):8-16,73.
- [36] 张宏,吴爱玲,邓善萍,等.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定量评价研究[J].体育学刊,2022,29(2):59-65.
- [37] 刘涛.基于FAHP的体育设施融资模式应用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1):89-94.
- [38] 叶楠,王培根.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FAHP综合评价模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9):17-19.
- [39] 彭春兰,龙佩林,白晋湘,等.新时代我国民俗体育治理体系构建及地方性策略选择[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0):20-26,55.
- [40] 孙波,姚绩伟,王书彦,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价值定位、现实困境与时代进路[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3,42(2):138-144.
- [41] 徐勇.城乡一体化视域中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思维——评《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J].中国行政管理,2014(10):117-120.

作者贡献声明:

谭志刚:论文选题,论文框架设计,论文指导修改;  
陈志远:数理统计,论文撰写,研究设计。

##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Neighboring Village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TAN Zhigang<sup>1</sup>, CHEN Zhiyuan<sup>2</sup>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Folk sport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sports governance. Taking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physical-factual-humanistic methodolog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folk sports governance. Using five villages in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as case study area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validated, improved, and empirically studied using decision experiments and evaluation experiment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factual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n evaluating folk sports governance, followed by the human factor and the physical factor;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in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was “average”, the human dimension “good”, and the physical dimension and the factual dimension “average”, and the sub-dimensions showed great variability. Combining the findings, the article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folk sports in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from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folk sports governance.

**Key words:** folk sports governance; evaluation system; WSR methodolog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neighboring village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

(上接第23页)

## Three-Dimensional Logic and Innovation Path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IN Peng<sup>1,2</sup>, REN Bo<sup>3</sup>, WANG Kai<sup>2</sup>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examining the governance issue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sports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physic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ogic and path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suggested that: ①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ndows the governanc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hich is reflected in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ser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sports market entities as the internal logic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jointly governing multiple entities as a powerful lever for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②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sports industr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o deepen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reform in the sports field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and ensure fair governance; play a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the alloc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t the market level, and stimulate governance vital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③ The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clude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sports and promoting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ports ent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rule of law and enhancing spor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optimizing the sports market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sports industry assessment system and stimul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ports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sports governance.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orts industry;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capacity; governance efficiency